

## 第二章 軍事發展與相關發展理論

權力是理解國際關係的關鍵。國家存在的根本目標是加強權力與安全，所謂國際政治就是國家間政治或權力政治，這種以關注國家安全與國際和平為宗旨的高層政治是不同於以促進經濟社會福利為宗旨的低層政治的，在這種政治中，武力和武力威脅是國家推進其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衡量國家的權力主要是看國家的軍事能力，由於每一個民族國家的責任都是維護自身利益提供自身安全，因此所有國家的共通特性都是基於權力與安全，而不是基於道德和理想進行外交決策。因此，本章希望透過與軍事發展相關之發展理論的三個面向來探討軍事發展的關係脈絡。

### 第一節 從現實主義理論來看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扮演世界秩序仲裁者的功能不彰，使得基於權力政治出發的現實主義成為學術界最具解釋與預測力的理論之一，發展到今天，現實主義學派雖然對各國領導部門如何形塑國家的發展戰略，有著深植人心的影響力，現實主義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是一門基於對歷史事實的觀察而發展出的學科，企圖在歷史經驗中找出符合人類行為模式的一般化概念，以之作為描述預測國家行為及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指導。

現實主義的學派基本上可分為兩派，葛漢在其所編著的「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一書，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又名結構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以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為代表，結構現實主義則以華茲（Kenneth N. Waltz）為代表（蔡政文，1998：49）。無論是傳統現實主義或是新現實主義學派，均以國家為中心研究對象，強調國家利益與理性決策。他們認為國際系統處於無世界政府一般的狀態故

系統中成員的根本利益---國家的生存與安全會不斷地受到威脅，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並沒有有效的權威能夠限制各國之間的相互競爭，而各國為求國家生存的維繫不斷增大自己的權力，極易導致互動中的國家關係走向競爭，競爭又不可避免地導致國與國的衝突。而這兩派基本上對國際社會與國家關係的本質有以下相同的觀點：

1. 國際社會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社會中的主要行為者（胡祖慶，1997：95）。
2. 國際社會的本質將是衝突不斷的。一方面由於國際社會資源的稀少及市場的競爭性，使各國必然產生競爭關係；另一方面是基於無政府國際狀態的本質，每個國家對他國意圖不明所感受的不安全感，極易使國家走向安全困境的局面。
3. 國際社會的特質是權力政治。因為缺乏合法暴力的壟斷者與世界政府，使國家間的爭議最後只能訴諸權力政治，故權力本身不僅是國家生存的重要手段，也成為裁斷公平正義的最終力量。

雖然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都認為衝突是國際關係的根本特徵，但兩者對國際關係衝突本性的來源看法卻不一。摩根索認為衝突歸於人類本性，而華茲則認為是由於國際體系中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具體而言，傳統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立論的不同之處在於：

1. 在哲學推論上的來源不同。傳統現實主義採用類於社會與歷史學演繹歸納之方式，新現實主義則引用個體經濟學的概念企圖將國際政治學科學化。
2. 對於「權力」本身的看法不同。前者強調國家追求權力和安全的極大化，於是權力本身極易成為國家追求的最終目的結構現實主義則是認為安全才是國家至高目標，權力只是達成國家安全的手段工具。
3. 設定的「變項」不同。傳統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和國家利益引導了國家

行為的產生，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無政府狀態和世界體系內權力分配的結構將會限制國家行為的選項。

4.對「國家能力」的看法不同。前者在分析權力時重視單一或特定國家與聯盟間相對權力關係的變化，進而使得國家間的決策關係變動；後者重視系統中權力集中的程度，可由主要強權國的數目作為斷定。

綜上而言，傳統現實主義認為系統是由單位成員、成員間的互動與結構三者合組而成，並認為互動關係是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故在研究中注重影響國家互動的過程因素(如國際體制、國際法規條約等對國家的影響)；新現實主義則重視國際競爭與混亂的本質，想以系統化理論來解釋國家行為，國際體系的組成單元經由社會化而使其行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可預測性，使它們之間的差別由彼此的國力大小決定，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的不同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地位決定國家的對外行為，故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便成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新現實主義才會又稱為結構現實主義。

在體認到在現實主義理論下，國際環境是處於「無政府」的自然狀態，暴力建立和維護秩序是一條基本的歷史定律，絕對的暴力維持絕對的和平，相對的暴力維持相對的和平。國家或國際社會的失控歸根到底是暴力失控，以中國古代為例，夏、商、周三代和平基礎是一元化暴力結構，三代後期的戰亂是一元化暴力結構被打破的結果。歷史上大多數的和平都是以武力為後盾的，微弱的武力支撐短暫的和平，強大的武力支撐較長時間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世紀的「冷戰」和平格局是由「相互確保摧毀」的大量核武器來支撐的，沒有武力支撐的和平是不存在的，這反映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性，任何一種正確的和平理論都不應違背這種一致性。

在此一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中共的領導人對軍事發展的相關言論

中，有無違背這種一致性？而中共領導人對軍事發展上的言論，會進一步轉化為其主政時期的軍事戰略思想，在中共官方的認知當中，軍事戰略有著以下的特點與趨勢：

一、軍事戰略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戰略，不只是追求戰爭的勝利，而以國家利益為得失，以國家戰略的目標為目標。

二、軍事戰略不只是計畫如何打贏戰爭，而且計畫制止戰爭，維護和平已成為軍事戰略的主要任務。

三、軍事戰略沒有平時或戰時的區分，在平時，軍事戰略包含發展軍事理論，建設軍事力量，以期在發生戰爭的時候，可以有效率的打贏戰爭。

四、軍事戰略指導武裝力量的運用，同時也指導武裝力量的建設。

故從其各時期領導人主政時的軍事戰略思想中，可窺見其軍事發展與現實主義國際環境下的國家生存法則有無一致性。茲列敘如下：

國家因本身利益與目的的不同，所形成軍事戰略的特點和規律也會有所不同，更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軍事思想是一國對於武裝部隊意圖與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成為各國軍事競逐的一個評估方式。

在毛澤東主政時期，中共的戰略思想主要是以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作為主軸，認為在中共武器裝備不如敵人的前提下，就更加要凸顯以人為主體的效用，當時中共的戰略觀認為由於東西方持續性的冷戰，使得世界大戰將會爆發。可見毛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走對外主攻的「霸道」之路。

在鄧小平所主政的改革開放之後，當時中共的戰略觀點是認為大戰雖然難以避免，但是卻會遲緩發生，中共當時重要的主軸就是強調經濟上的改革與開放。到了 1984 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會議上也提出了大戰可以避免的觀點，並擴大了對於戰略的研究風潮。在中共的十三大軍事科學院就完成了「關於確立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的意見」，主要重點就是由

全面戰爭轉向局部戰爭的戰爭觀。80 年代福克蘭群島之戰與貝卡山谷之役，以及 1991 年波斯灣戰爭與 1999 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戰事，驗證中共研究高科技戰爭的動機與方向。可見鄧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對外主防的「富國」之路。

而當江澤民在 90 年代初掌握中共軍委後，更確立了「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在 1995 年臺海危機之前，已按照這個方向進行「著眼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訓練。可見江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走化量為質的「強兵」之路。

如今由胡錦濤主政之後，其軍事發展仍持續江澤民時期之「素質」與「科技現代化」的提升，然而再加上其初倡的「和平崛起」之和平發展的國家利益取向，似乎預示胡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不是要走暴力決定論的「霸道」之路，而是想走讓崛起後的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秩序的「王道」之路，與現實主義國際環境下的國家生存法則只談「利益」不講「道德」的情形不同。

因為暴力建立和維護秩序屬於不帶任何價值判斷的客觀描述，加入「道德」的價值判斷則要關注暴力所要建立和維護的秩序是否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取決於秩序是否符合公正、平等、正義等原則。和平是一種秩序，若是符合這些原則，則暴力被視作「正義的力量」，反之則被視為邪惡的力量。因此，以武力為後盾的和平僅僅符合歷史和邏輯的要求，而以武力為後盾的、符合公正、正義原則的和平不僅要符合歷史和邏輯的要求，也還要符合倫理的要求。這對一個生存在現實主義國際環境下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是一個極高標準的自我期許。

美國不僅仍然是世界上唯一霸權，而且還是一個和中國未來休戚相關的霸權。臺灣問題的解決、中國作為商貿大國的崛起、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聯合國改革，乃至中國和鄰居日本關係的未來走向，都脫離不了美國的影

子。美國對保持其作為唯一大國地位的擔憂經常轉化成為對華關係的話語和具體政策，美國時而低估中國的崛起，時而又高估中國崛起所能產生的影響。各種不同的論調因時因人而不同。「中國威脅論」一直在美國佔有重要地位，圍繞著「中國威脅論」的則是各種諸如圍堵和遏止中國崛起等論調和政策的話語。「中國威脅論」也是最近美國軍方《中國軍力報告》的主題。這個報告毫不保留地把中共刻畫成一個野心勃勃、熱衷於軍事準備的大國，報告一出籠自然引起中共不快。

美國逐漸轉向現實。但是，在這樣一種空前的「中國威脅論」的話語中，也隱藏著美國對華政策的微妙轉型，即從布希政府早期的新保守主義逐漸轉向較為傳統的現實主義。新保守主義具有原教旨主義的味道，把道德的東西塞到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裏。美國唯「我」獨尊，因為「我」就是道德的化身，而現實主義則是國家利益至上，權力至上。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有理性計算的基礎。

在對華政策方面，隱含在國防部長倫斯斐等鷹派政治人物的強硬聲音背後的則是對中共崛起的無奈認可。美國認識到，儘管自己還是唯一的霸權，但畢竟不是全能的上帝。在維護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還需要中共合作，包括全球反恐戰爭、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全球經濟的平穩發展等等。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也開始意識到，中共畢竟不是往日的蘇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在中共開放發展的條件下，要像往日圍堵蘇聯那樣圍堵中共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美國所能做的就是對中共的崛起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最大程度上來「消化」中共崛起對美國所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美國的這種微妙變化和中共所宣示的崛起方式有很大的關聯。對美國一波又一波的「中國威脅論」，中共一直表示不快。但對美國對中共崛起的擔憂，中共也表示了相當的理解。在世界歷史上，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要對既有的世界秩序產生深刻的影響。處理得好，就能有效維持世界和

平；處理不好，說不定會導致大國間的衝突。中共的崛起也不例外。如何維持世界秩序不僅是現存大國美國的事情，而且也是在崛起的中國的事情。對中共來說，是一個以何種方式崛起的問題；對美國來說，則是如何應付中國崛起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同等重要，對任何一個問題的忽視都會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

中共外交軟硬兼施。正因為這樣，中共方面已經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論，並且努力把這個理念體現在中共的各種國際政策行為中。近年來中共積極推行的經濟外交、多邊主義和睦鄰政策都是「和平崛起」理論的具體體現。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共必須明確表明自己的意圖，那就是「和平崛起」。

實際上，近年來中共的外交行為已經不是「韜光養晦」策略所能概括的了。中共在一系列有關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毫不動搖，堅持原則，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又有所妥協。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共已經表明了鮮明立場；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中共的作為已經開始超越幫助美國的角色；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共既回避國際的壓力，同時又靈活地調整匯率，既對其社會本身負責，又對國際社會負責。

而就美國和中共要互諒互讓消除誤解來說。最敏感的要算是中共的軍事發展問題了。儘管中共並沒有走上昔日美蘇軍備競爭的道路，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共正常的軍事現代化勢必成為必然。美國擔心中共軍事力量的崛起對其霸權地位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其在亞洲影響力的問題。美國所採取的一系列軍事調整很顯然是針對中國崛起的。

即使在軍事上，中共也要理解美國的擔憂，因為即使是中共正常的軍事現代化在客觀上也會對區域政治產生不小的影響。中共不僅要反制美國的遏止和圍堵，更重要的是要主動和美國進行接觸。要讓美國認知到作為一個地區大國，中共並沒有要把美國力量排擠出亞洲或者世界任何角落。

中共反對的是美國把中共排擠出那些對中共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國際領域。

中共需要的是和美國分享國際空間，共同維護世界秩序，這就是中共刻意要和美國建立「戰略夥伴」的主要動機。的確，只有和美國建立了這樣的「戰略夥伴」，中共才能真正崛起，美國也才能真正「消化」中共的崛起對其所能產生的衝擊。

## 第二節 從現代化理論來看

當前，高新技術正在世界範圍內迅猛發展。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深刻改變著世界的社會經濟面貌，也正在深刻改變著軍事發展的面貌，引發了軍事領域一系列革命性的變化。武器裝備呈現出資訊化、智慧化、一體化的趨勢，各種武器裝備聯結為一個有機體系，遠程攻擊能力大大增強，打擊精度空前提高，殺傷力成倍增長。戰爭形態、作戰樣式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全縱深作戰、非線式作戰有可能成為高技術條件下戰爭的基本交戰方式，但是軍事發展必須配合發展理論的討論，才能獲得配合。

在結構功能學派的影響下，對開發中國家發展問題的研究在五、六〇年代逐漸形成「現代化理論」，由於現代化理論將社會變遷視為如同生物成長一般不斷地進步，經由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從比較簡單的組織形式進化為比較複雜的現代形式，故從現代化理論來看中共的軍事發展，從鄧小平於 1978 年推行「改革開放」與「四個現代化」開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時代，拉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中共在廿世紀末的後二十年進行了一場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共的經濟改革是國家起主導作用，由鄧小平領導。在他的時代，所要維護的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制度。所面對的現實是經濟落

後、人民貧困、國力不強。1974年，鄧小平當時為第一副總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他根據周恩來的指導提出了「四個現代化」政策，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全面現代化。軍事建設思想也從1985年出現轉變，將毛澤東時期的「早打、大打、打核戰」的人民戰爭觀念朝向和平時期軍隊建設方向走目的在全力發展經濟建設減少國防經費支出，避免排擠經濟建設所需的資源。不過，鄧小平也認為在集中力量加強經濟建設的同時，由於國際環境對中共而言仍具戰爭危險的威脅，所以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反侵略戰爭，中共要有計畫、有重點、有步驟地實施國防現代化。

九〇年代中共現代化，主要在調整文革時期全面備戰狀態對國家總體資源的沉重負擔，主要重點放在消除文革時期權力國度膨脹所呈現的「腫、散、驕、奢、惰」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並且把準備打贏現代戰爭的工作做好。

然而自1989年起的「蘇東波」效應，蘇聯解體、冷戰體系瓦解，世界局勢出現極大變化，再加上1991年波灣戰爭，美國以軍事高科技得到極輕微人員損失的勝仗，讓中共認識到世界局勢趨向和平同時也容易發生戰爭，更體認到現代化軍事科技的重要。有基於此，江澤民在1992年在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根據新的形勢變化明確指出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堅持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所謂新時期的軍事戰略方針，是指著眼於資訊化的來臨，國防建設和軍隊工作的指導思想也必須實現根本性的轉變，由數量規模型和人力密集型的軍隊結構向質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轉變。

就和其他學科一樣，軍事發展自有其傳承。中共的軍事發展可由其建國後軍事戰略的形成與演變來看，大略上可以分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時期，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以及波斯灣戰爭之後所謂的「高技術條件下

的局部戰爭」時期。每個時期由於領導者的風格不同，來自國內外的威脅程度以及各時期技術發展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共軍的軍事戰略思想可以分為三派：傳統主義者、新傳統主義者、軍事革命論者。傳統主義者服膺於毛澤東人民戰爭的理念，主張主動防禦的戰略準則，「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新傳統主義者則認為至少在周邊區域的層次上，共軍更要保有兵力投射的基本能力，如快速反應部隊的成立與海權的擴張則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軍事革命論者視未來為一種快速改變的時代，共軍要抓緊這波軍事事務革命的先進技術。以下就依上述分期論述中共軍事思想的調整與發展，並從而探究其軍事現代化的軌跡：

#### 一、傳統主義論者的人民戰爭

毛澤東的人民軍隊、人民戰爭與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可以說是共軍軍事戰略的基礎。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當中指出農民在革命之中的重要性，接著提出了人民軍隊的基本建軍原則和共黨在中國的革命是以農村包圍城市，以及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利用城市與農村之間不平衡的特點，突破這種脆弱環節，及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以武力奪取政權。其本質是利用中國大陸幅員的遼闊與眾多的人口，以持久性的消耗戰來殲滅或驅逐來犯的敵人。

傳統主義仍服膺於馬列毛主義的思想，如恩格斯理論中就論述了軍隊為了要贏得戰爭的勝利，主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本組成包括：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首先，人民軍隊的主要內容包含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的領導，人民軍隊是一個戰鬥隊，也是工作隊與生產隊。其次，人民戰爭也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並實行主力軍團、地方兵團與游擊隊和民兵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同時在農村建立革命的根據地，最後創造出一套

以人民戰爭為基礎，並與當時條件相結合的戰略戰術。傳統主義主要依恃「利用現有的武器並動員群眾，以擊敗擁有高科技武器的敵人」。奇襲與欺敵是人民戰爭最主要的兩個部分，這種戰術的使用主要可以在對日抗戰(1937-1945)、國共內戰(1945-1949)、抗美援朝(1950-1953)與懲越戰爭(1979)期間發現，特別是中共的懲越戰爭是最後一次大規模對境外敵人的軍事行動。在那場戰爭之中，中共軍方暴露出許多的缺點，遂有了 1980 年代的軍事現代化。這種軍事思想也需要在中國大陸實施動員與在內陸保有相當的國防設施與自主的國防工業。

## 二、新傳統主義論者的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

長久以來毛澤東所強調的以群眾路線為主軸的人民戰爭理論，一直是共軍建軍的基本原則。但是在共軍建軍方向的紅與專問題上，共軍內部一直存有相當的爭議，一直到鄧小平掌權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才又統一在鄧小平所提出的「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理論」之下，強調的是現代軍事科技發展對於未來戰爭的效用。而在世界觀上，鄧小平否認了毛澤東對於世界形勢的判斷，他提出了「軍隊建設要從臨戰狀態向和平建設時期的軌道轉移」，他認為，「除非出現世界大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點不可動搖」，並要求軍隊「服從經濟建設大局」，「軍隊要忍耐」等主張。

當國防現代化在 1973 年時被引入共軍的概念時，共軍的軍事戰略產生了兩項重要的轉變。首先，在 1970 年代末期時，人民戰爭的概念逐漸被「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所取代。因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所強調的是贏得戰爭的方式，而不只是人民戰爭所需要面對的戰爭型態。現代條件的人民戰爭所強調的是在邊境上就擊敗敵人的有限戰爭，用先進的技術與聯合作戰兵種，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同時新傳統主義也認同兵力投射的觀念，也就是把共軍送到中共國境之外的能力，但這目的是區域性的並非是全球性的。

新傳統主義的軍事思想主要是希望不用放棄重要的經濟與工業建設的前提下，防範其他外部威脅對中國大陸的攻擊行動，將陣地戰、聯合兵種戰術以及運用正規與機械化部隊，在敵人可能進入中共領土之前就讓其行動受阻，這種的方式讓首戰即等於決戰，衝突初期階段的勝負就變得相當重要。

新傳統主義建軍路線的最大特色就是加強軍隊現代化、正規化與機動性的發展。其中尤其重視軍隊在高科技條件下的作戰能力。在這種的指導方針之下，人民戰爭、民兵與一般群眾的作用大幅縮減。同時也合併大軍區、撤銷許多軍、師級單位，成立集團軍、實行軍政文民整體化訓練，進行軍事幹部的檢討，恢復學生軍訓、國防科技研發和走向「軍轉民」的方向等等。

### 三、軍事革命論者的高科技局部戰爭

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為中國大陸帶來的不只是富裕而已，也為中國大陸的政治角色與軍事現代化帶來信心與潛力，而國防現代化的進展更使得中共可能成為亞洲未來重要的角色之一。經濟的發展使得共軍可以添購較好的設備與武器，使共軍逐漸成為世界級的武力之一，而在和其他國家進行軍事交流的過程當中，共軍的領導者逐漸明瞭其本身軍事戰略的落後之處，而且也積極的引進西方的軍事思想。

波斯灣戰爭的發動與快速的結束，也對中共的軍事戰略帶來不小的震撼。這讓中共的軍事戰略朝向不同於以往的方向：著重於研究與發展先進武器技術、把軍事訓練提升到戰略地位、強化動員體制與後勤保障，以及加強軍事理論的研究。

江澤民自 1992 年 10 月中共第十四次大會之後，即不斷宣揚他的治軍理念，也就是在戰備整備上，由打贏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

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在戰爭觀上，共軍認為未來戰爭的型態將趨於多樣化，如電子戰，特別是波斯灣戰爭就是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高技術戰爭；空襲戰，強調的是各航空兵種與長程武器的打擊作戰；「點穴」式的精準打擊作戰，特別是重點式的攻擊軍事戰略目標，避免平民的損傷；以及非接觸性作戰，也就是不直接兵力接觸的軍事行動，以減少人員的傷亡。

在這段時期中，中共國防發展戰略的基本走向為：首先在於保護國家安全和服務於經濟建設；第二，確立冷戰後中國大陸安全戰略，至少包含三項原則：加強國防現代化以提高自衛能力；支持區域安全合作，減少潛在的軍事衝突；發展睦鄰友好關係以建立相互信任；第三，提高國防科學水平和中高級軍事指揮官的學科素養；第四，贏得高科技條件下的戰爭。在共軍決策者的眼中，高科技戰爭所帶來的軍事事務革命不只是新的軍事理論，同時也是新型態的精緻的毀滅性力量。

共軍內部的軍事革命論者則強調要「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來評估與改革其作戰指導。共軍在過去的數年當中形成了高科技戰爭的兩種趨勢，一種是低估技術在軍事思想的效用，以致於有些共軍認為可以不用太重視技術的發展，畢竟使用與發明這些技術的還是人；第二種則是「唯武器論」，認為軍事武器可以取代戰爭準則，特別是導彈或核武乃至於網路即可贏得任何戰爭。

這三個時期所引伸的中共軍事思想的傳統主義、新傳統主義與革命主義，為共軍未來的發展提供了理論與實際的依據。特別在國防預算或國防資源的配置上，傳統主義強調要建設陸軍，認為陸軍才是最後的決勝兵種，新傳統主義則傾向於把國防資源投資在快速反應部隊或可以突破第二島鍊的海軍，而革命主義則主張將國防資源投注在資訊建設以及二砲或導彈的研發與強化。這三種共存的軍事思想在中國大陸幅員廣大的空間剛好

符合其軍事思想的適用性，配合其軍區制度與各地不同的安全需求，中共中央讓各地依照自身不同的需求發展不同型式的軍隊。

而在「二〇〇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一文中，其中第二章描述中共的戰略，包括中共不確定的未來、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及遠超過對付台灣所需的軍事現代化。今年的報告延續擴大同一主題，指出中共仍未適當解釋「軍事擴張的目的與想要達到的最終狀態。」

### 第三節 從依賴理論來看

依照現代化理論的看法，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所追求的國家目標與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先進國家起步較早，落後國家起步較晚而已，所以落後國家只要能夠瞭解先進國家的發展過程並學習其發展的方法，避免重蹈先進國家所犯過的錯，減少一些嘗試的錯誤，還可從先進國家引進技術，節省研究發展的時間精力，就可以快速達成發展的願望。

然而依賴理論的看法則認為，較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國家)一開始雖然國家發展可以有不錯的表現，但後來出現工業發展停滯，經濟發展趨緩的現象，原因就是當落後國家在資金籌措、技術引進及原料供應皆需仰賴先進國家供應，想要透過先進國家支援來建立較自主的國家發展體系時，同時造成自己國家的國家發展嚴重地依賴先進國家，當先進國家的國家利益與自國本身國家利益相衝突時，較落後國家則容易受先進國家處處掣肘，無法自拔。

因此中共的軍事發展，在其 1949 年建政之初便已極度仰賴蘇聯的軍事裝備與軍工科技的支援，依照依賴理論所述，中共在軍事發展上原本應該受蘇聯極大的影響，後來得遇 1989 年起的蘇聯解體，軍事發展上不再受蘇聯制約，且與後來繼蘇聯而起的俄羅斯從事軍事交流，反而得以維護

住其自身的軍事發展自主性，以前蘇聯遺留的軍事科技工業基礎在自行研發其軍工科技發展道路。

同時，中共自建政以來，長年飽受美俄兩個大國的軍事壓迫，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稍有緩和，之後中共雖然出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目標，然而在「軍事發展」上卻也認知到要降低強國的軍事威脅不能僅僅以軍事力量為考量標準，還需以科學技術、經濟活動等綜合國力的均衡發展才能達到。

所以，美國在波灣戰爭的勝利，為戰爭型態帶來了新一波的革新，戰場資訊化已成為未來戰爭型態的主流，在美國「軍事事務革命」的浪潮中，為因應未來戰爭的型態，中共也積極推動「軍事事務革命」，並有許多積極的作為，用來避免走進依賴理論所述的困境。

舉例來說，在「國富、民富、不等於國強」的理念下，中共深知發展「太空科技」為趕上先進國家捷徑之一，50年代中期中共從前蘇聯引進P-2型地對地導彈，開始發展導彈之液體火箭發動機。

到了60年代中共與蘇俄關係惡化，中共靠自力摸索學習而建立基礎，1968年12月於「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第一枚自製的中程運載火箭；1970年4月24日成功發射第一枚「東方紅一號」實驗衛星，使中共成為繼蘇俄、美國、法國、日本之後第五個完全靠自己實力成功發射衛星之國家；

其中雖然在1974年11月5日發射首枚返回式人造衛星失敗，不過3年後(1975年)11月26日第二枚返回式人造衛星成功發射，為繼美、蘇強權後第三個具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1984年1月29日發射第一枚同步通信衛星失敗，同年4月8日第二枚同步通信衛星成功發射，4年後(1988年)9月7日第一枚氣象衛星成功發射，同年底配合美國「鈹計畫」，運用長征4號火箭陸續將10枚行動電話通信衛星(摩托羅拉公司所有)送入太空。迄

今，中共先後成功發射 61 枚各類型衛星，尤其是 1999 年發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號」圓滿成功，則象徵中共航天事業已躍上國際新臺階。故從「依賴理論」角度來看，中共的軍事發展的確除了順利吸收先進國家的經驗外，也成功地建立起自主的軍事發展體系。

而中共在軍事發展上為了突破依賴鏈，也積極地從事自主研發武器戰術的作為，其中以「太空戰」的研發最為顯著。當 1985 年美國成立「聯合太空軍事司令部」，以統一組織和管理太空戰指揮任務。中共則於 1988 年成立「軍事航天研究中心」，專研太空戰等軍事太空技術，以期能對美國的太空優勢構成新的挑戰。1994 年 5 月中共在東山島軍事演習（東海四號），其攻臺主力（共軍南京軍區所屬第 31 集團軍）實施登陸演訓時，首次運用偵察衛星、通信衛星以及氣象觀測衛星三大系統，對目標區實施情蒐及情傳。2000 年 1 月 26 日中共在國家「航天科技發展戰略規劃」明確指出：未來(2000 - 2015 年)將積極開發航天（空）電子訊息、戰略防禦、深層反擊、激光及非常規材料等系統之太空高科技技術，以強化其太空深層反擊（防禦）的戰略能力；2001 年 6 月「東海六號」（又稱解放一號演習）軍事演習，首次運用 2 枚全球定位衛星，在偵察衛星的配合下，對臺灣海峽 350 浬（約 650 公里，範圍涵蓋臺灣東部海域），進行偵察與監偵外，並模擬對抗美軍介入臺海衝突為目標；21 世紀資訊化時代的戰爭將是高科技戰爭，未來戰爭也是爭奪太空控制權和爭奪資訊傳遞權的戰爭，誰先掌握太空，誰就控制資訊，誰控制資訊，誰就贏得戰爭；由於太空作戰牽涉到科技領域非常龐雜，目前衡量一國太空作戰能力，主要係以該國衛星與太空船的研製實力為依據，中共「太空科技」的規劃與發展，其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完整的高防禦戰略系統」和「深層有效反擊技術系統」，以打贏未來的高科技戰爭，也可視為中共在軍事發展上為了打破依賴理論下發展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論」所做的努力。

表 2-1 關於中共「新軍事革命」發展階段與目標

發展階段	發展目標
初 級 階 段 1990-2020 年	1.原有軍事體系的改造與改革; 2.發展新的武器裝備; 3.創造新的軍事理論; 4.造就新的體制編制; 5.研創新的作戰方法。 此階段係以新軍事技術革命為主導
高 級 階 段 2020-2050 年	1.整合初級階段形成之各個新的軍事要素; 2.構建真正反映時代特色、技術發展和軍事需求之新的 軍事體系; 3.用新的軍事體系取代原有的軍事體系,以實現軍事領 域的整體性革命。 此階段係以軍事學說革命為主導
完 結 階 段 2050 以後	1.軍隊編制構成系統發生全面性變革; 2.軍事系統的組織、結構和制度脫胎換骨; 3.軍事活動方式也根本改變。

	此階段係以編制構成革命為主導
--	----------------

資料來源：(孟飛，1999：91-92)

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何在？對此，中國領導人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是：中國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展自己。從本質上說，和平崛起發展道路乃中國的國際戰略抉擇。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也是為周邊國家普遍能夠接受的國際戰略抉擇。

前些年，國際上有人討論所謂「中國威脅論」。這種論調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產生了種種負面的影響。為了消除這種影響，近年來，中國在堅持傳統睦鄰友好政策的基礎上，針對周邊國家進一步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富鄰、安鄰」的政策方針。不難看出，這樣的睦鄰政策不僅體現了中國的道義價值取向，而且也被賦予更加現實的共同利益因素。

#### 第四節 小結

本文透過發展理論與現實主義理論來探討軍事發展的關係脈絡。從現實主義理論觀察中，主要是從各領導人主政時的軍事戰略思想探究，茲列敘如下：

表 2-2 中共各領導人主政時期軍事戰略思想

領導人主政時期	戰略思想	現實主義下的反應
毛澤東	中共的主要是以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作為主軸，認為在中共武器裝備不如敵人的前提下，就更加要凸顯以人為主體的效用，當時中共的戰略觀認為由於東西方持續性的冷戰，使得世界大戰將會爆發。	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走對外主攻的「霸道」之路。

鄧小平	<p>改革開放之後，當時中共的戰略觀點是認為大戰雖然難以避免，但是卻會遲緩發生，中共當時重要的主軸就是強調經濟上的改革與開放。</p> <p>1984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會議上也提出了大戰可以避免的觀點，並擴大了對於戰略的研究風潮。在中共的十三大軍事科學院就完成了「關於確立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的意見」，主要重點就是由全面戰爭轉向局部戰爭的戰爭觀。並積極推動「四個現代化」。</p>	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對外主防的「富國」之路。
江澤民	在 90 年代初掌握中共軍委後，更確立了「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在 1995 年臺海危機之前，已按照這個方向進行「著眼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訓練。	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走化量為質的「強兵」之路。
胡錦濤	軍事發展仍持續江澤民時期之「素質」與「科技現代化」的提升，然而再加上其初倡的「和平崛起」之和平發展的國家利益取向。	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的反應，是想走讓崛起後的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秩序的「王道」之路，與現實主義國際環境下的國家生存法則只談「利益」不講「道德」的情形不一致。

資料來源：表格自製。

由上述整理，可得之國家因本身利益與目的的不同，所形成軍事戰略的特點和規律也會有所不同，更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軍事思想是一國對於武裝部隊意圖與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成為各國軍事競逐的一個評估方式。

並且在外交政策上，亦逐漸發展出兩特色，即軟硬兼施的中國外交與互諒互讓消除誤解。

以軟硬兼施的中國外交策略來看，中共方面已經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論，並且努力把這個理念體現在中國的各種國際政策行為中。近年來中國積極推行的經濟外交、多邊主義和睦鄰政策都是「和平崛起」理論的具體體現。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共必須明確表明自己的意圖，那就是「和平崛起」。實際上，近年來中共的外交行為已經不是「韜光養晦」策略所能概括的了。中國在一系列有關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毫不動搖，堅持原則，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又有所妥協。

以互諒互讓消除誤解來看。最敏感的要算是中共的軍事發展問題了。儘管中共並沒有走上昔日美蘇軍備競爭的道路，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共正常的軍事現代化成為必然。美國擔心中共軍事力量的崛起對其霸權地位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其在亞洲影響力的問題。美國所採取的一系列軍事調整很顯然是針對中國崛起的。在軍事上，中共也要理解美國的擔憂，因為即使是中國正常的軍事現代化在客觀上也會對區域政治產生不小的影響。中國不僅要反制美國的遏止和圍堵，更重要的是要主動和美國進行接觸。作為一個地區大國，中國並沒有要把美國力量排擠出亞洲或者世界任何角落。中國反對的是美國把中國排擠出那些對中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國際領域。中國需要的是和美國分享國際空間，共同維護世界秩序，這就是中國刻意要和美國建立「戰略夥伴」的主要動機。的確，只有和美國建立了這樣的「戰略夥伴」，中國才能真正崛起，美國也才能真正「消化」中國的崛起對其所能產生的衝擊。

從現代化理論觀察中，國防與科技相輔相成，中共的軍事發展從 1978 年推行「改革開放」與「四個現代化<sup>1</sup>」開始，軍事建設思想也從 1985 年出現轉變，目的在全力發展經濟建設減少國防經費支出，避免排擠經濟建

---

<sup>1</sup> 所謂「四個現代化」指的是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及科技現代化。

設所需的資源。在集中力量加強經濟建設的同時，對中共而言仍具戰爭危險的威脅，所以為了應付未來戰爭，中共實施國防現代化。中共現代化到了九〇年代，主要重點放在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並且準備打贏現代戰爭。之後江澤民在 1992 年在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根據新的形勢變化堅持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由數量規模型和人力密集型的軍隊結構向質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建軍。

中共的軍事發展可由其建國後軍事戰略的形成與演變來看，大略上可以分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時期，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以及波斯灣戰爭之後所謂的「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時期。每個時期由於領導者的風格不同，來自國內外的威脅程度以及各時期技術發展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本文亦從共軍的軍事戰略思想（傳統主義者、新傳統主義者、軍事革命論者）來探究。傳統主義者服膺於毛澤東人民戰爭的理念，主張主動防禦的戰略準則，「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新傳統主義者則認為至少在周邊區域的層次上，共軍更要保有兵力投射的基本能力，如快速反應部隊的成立與海權的擴張則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軍事革命論者視未來為一種快速改變的時代，共軍要抓緊這波軍事事務革命的先進技術。依中共軍事思想的調整與發展，並從而探究其軍事現代化的軌跡。

並依現代化理論的看法，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所追求的國家目標與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先進國家起步較早，落後國家起步較晚而已，所以落後國家只要能夠瞭解先進國家的發展過程並學習其發展的方法，避免重蹈先進國家所犯過的錯，減少一些嘗試的錯誤，還可從先進國家引進技術，節省研究發展的時間精力，就可以快速達成發展的願望。

然而依賴理論的看法則認為：第一，在 1949 年建政之初便已極度仰

賴蘇聯的軍事裝備與軍工科技的支援，依照依賴理論所述，中共在軍事發展上原本應該受蘇聯極大的影響，後來得遇 1989 年起的蘇聯解體，軍事發展上不再受蘇聯制約，且與後來繼蘇聯而起的俄羅斯從事軍事交流，反而得以維護住其自身的軍事發展自主性，以前蘇聯遺留的軍事科技工業基礎在自行研發其軍工科技發展道路。第二、中共自建政以來，長年飽受美俄兩個大國的軍事壓迫，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稍有緩和，之後中共雖然出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目標，然而在「軍事發展」上卻也認知到要降低強國的軍事威脅不能僅僅以軍事力量為考量標準，還需以科學技術、經濟活動等綜合國力的均衡發展才能達到。第三、在美國「軍事事務革命」的浪潮中，為因應未來戰爭的型態，中共也積極推動「軍事事務革命」，並有許多積極的作為，用來避免走進依賴理論所述的困境。第四、而中共在軍事發展上為了突破依賴鏈，也積極地從事自主研發武器戰術的作為，其中以「太空戰」的研發最為顯著。

較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國家）一開始雖然國家發展可以有不錯的表現，但後來出現工業發展停滯，經濟發展趨緩的現象，原因就是當落後國家在資金籌措、技術引進及原料供應皆需仰賴先進國家供應，想要透過先進國家支援來建立較自主的國家發展體系時，同時造成自己國家的國家發展嚴重地依賴先進國家，當先進國家的國家利益與自國本身國家利益相衝突時，較落後國家則容易受先進國家處處掣肘，無法自拔。